

批点本的内部流通与桐城派的发展^{*}

徐雁平

内容提要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中诸多信息可反映桐城派形成的机制和文学特质。姚氏对桐城乡贤、桐城派著述的偏重，是其家学意识和流派意识的显露，由其读书活动所涉及的书与人，可见一个以血缘、姻亲、师友等关系形成的桐城派文人圈。桐城派的著述中编选、批点著述相当丰富，其中蕴涵桐城文章之学、桐城诗学的重要内容。以姚永概等桐城文家来考察，围绕批点本存在一个“批点本书籍交流网络”，这一网络的“私密性”是家学传承秘不外传风习的一种表现；而家学的“私密性”，也是形成桐城派“地域性”的基因。桐城派中后期过录批点风气的形成，意味桐城文章之学、桐城诗学开始进入累积、融汇与整合时期。过录中既有家学的累积，也有一流派之学的汇合，最后形成对该流派共同认可的经典文本较为稳妥、周全、细密的解读。对于一文学流派而言，这是框架建立后的丰实与充盈。

关键词 《慎宜轩日记》 姚永概 桐城派 批点本书籍交流网络 地域文学传统

引言

在古代的诸多文学流派中，如就其所涉及问题的深广，流派意识的明确，绵延时间的长远，以及存世文献的丰富诸方面作整体考量，当推桐城派为最佳代表。桐城派的形成演进及其特质，在桐城派研究中，颇受关注，近年有数种论著涉及^①。桐城派的结构与纲目在研究中已经显现，但仍有不少具体问题或关键性细节需要重新界定与探究，从而充实或更新对整个桐城派的认识。新材料的出现会引发新思考。姚永概《慎宜轩日记》收录姚氏十六岁（光绪七年，1881）至五十七岁（民国十一年，1922）的日记，较为全面地呈现姚氏“个人经历、家庭要事以及读书札记、社会见闻和时政消息”^②。姚永概是桐城派晚期重要人物，其日记稿本洋洋三十六册，可充分反映桐城派最后历史阶段活动境况；然日记价值不尽在此处，姚永概虽为桐城派晚期成员，但他作为桐城姚氏之后以及桐城家族网络中的一员，一身之负载，远非晚期时段所能限定；而姚永概突破时间限定、与前贤交接的方式，当是一以贯之的读书活动。由书籍的阅读及批点的过录，可见桐城派的知识、见解、理论如何经过姚永概的选择得以汇合；由此追溯，更可考求桐城派累积整合形成的印迹，从而证示桐城派的形成与发展，是一种着意经营的过程。与姚永概同时的马其昶注《韩昌黎文集》，稍晚的高步瀛在编选唐宋文时，这一用

^{*} 本文为程章灿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10&ZD130）阶段性成果之一。文章在修订过程中，采纳了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的建议，在此谨申谢忱。

^① 如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柳春蕊《晚清古文研究：以陈用光、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四大古文圈子为中心》，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笔者亦有二文讨论此问题，《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2004年12月）；《桐城文章中“尚有时世”：以同光年间莲池书院之讲习为中心》，《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3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桐城派”一般指桐城文派；本文所论，除桐城文派外，亦略及桐城诗派，特此说明。

^② 姚永概著、沈寂标点《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版，“前言”第1页。日记缺记情况，整理者沈寂在“前言”中有说明。

心建构的意图亦十分明显。为免以孤证立论之险，在以姚永概为中心论述时，也适当关照其他桐城派文家，表明书籍的阅读、批点的过录是桐城派衍化中颇具内涵的文化与文学传承行为。

一 读书乃“修业事”

光绪十四年，姚永概二十三岁，中江南乡试并名列第一。按张仲礼的考察，清人中举平均年龄大约在三十一岁^①，姚永概较早中乡试，于己于家族，皆为大好之事。此前，姚氏家族登进士第者二十一人，乡试中式者二十九人。姚永概自语云：“今距甲辰之年已四十五年，姚氏未有与春、秋试者，今年永概乃以江南第一人，遥承先德，缅怀在昔，固不仅以科名见重。”^②然姚永概父姚濬昌期待的“明年金殿恩荣宴”最终并未实现^③，姚永概在随后的己丑科、庚寅科、壬辰科、甲午科四次会试中皆不第。姚永概重科名，但并未为科名所困，在得知自己乡试中式后，有流言诽谤。他在十一月初九日回应性的日记中约略表露自己的心志：

予之以第一人中式，殊非所料，上溯吾乡赵、刘、方、张五前哲，不免滋惭。则外间之纷纷籍籍，分所应有，但吾之自勉又不在此。方今天下可为忧患者甚深且夥，而沾沾以一榜自喜，不几堕梅伯言所讥《文昌杂录》之说耶？^④

此等心志，在姚氏日记所记的读书活动中有清晰的表现。《慎宜轩日记》始于光绪七年，其时姚永概十六岁，年末有关于一年读写的总结：“今年作古文三首、时文二十四首、诗四十三首、试帖十六首，阅《四书反身》一本未毕、《庸训》一本、《培远堂手札》三本、端恪公（姚文然）《外集》一本、《易知录》二十八本未毕、《史记》六本未毕、《邵亭诗钞》二本，得札记六十二则，抄独建斋选绝句二卷、曾子固五古一卷、毛生甫五古一卷、张廉翁诗一卷、海峰先生选五律一卷未毕。”^⑤细检此年日记，所读之书还可补充陆游诗、韩愈诗文、杜甫诗、黄庭坚诗、《世说新语》、《孟子》、《东莱博议》、姚鼐诗文、姚莹《后湘诗集》等。时文、试帖诗只是姚永概丰富的读写生活中的一部分，从日记记录看，似不能成为核心部分。光绪九年三月二十日日记云：

予将工课分刚柔二日，刚日读经、读儒家书、读古文诗，柔日读史、读经济及时事书、读时文试帖，而作字则每日早为之，不间也。^⑥

这一读书格局在姚永概追求科名的过程中，一直得以延续。刘成禺指出旧时童蒙读书风气各有区别，有书香世家、崛起、俗学之分，“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于八股试帖，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⑦。姚永概从容不迫的读书格局，无疑可入“书香世家”一类，此处亦可援引姚永概父引导他为“有用”之学之语作为旁证^⑧。正是由于此类家学的延续，包括姚永概在内的

① 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张仲礼考察数字来源于道光十四年与咸丰元年直省两榜乡试。

②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371页。“甲辰之年”指姚永概伯父姚鸾道光甲辰年中式举人。

③ 姚濬昌诗句见《慎宜轩日记》，第370页。

④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369页。

⑤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41页。

⑥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117页。

⑦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⑧ 姚永概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日记云：“父亲言，人不可为无用之学，须于农田水利上讲究一番方好。因开各当看书为一单，分地理（天文附）、兵盐、漕河、水利、农田、度支、礼乐、洋务数门，逐一细究，方能有用。汝等资质尚好，可勿负也。概谨志之。”（《慎宜轩日记》，第125页）

桐城子弟才能不为“俗学”束缚，代有文人学者出，故能传承桐城人文统绪。

姚永概对举业似较有把握，这似乎源于他“取法乎上”的读书计划，也有来自桐城文章的优越感。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记：“拾得陈大士、金正希残稿，因重装之。又二兄故时手抄百川、望溪文，阅之足应试矣。”^①现选取光绪七年（1881）至宣统三年（1911）《慎宜轩日记》，统计分析姚永概的读书情况。在此期间，姚氏较为集中阅读的前代著述有七十余种^②，桐城乡贤著述和桐城派诸家著述近七十种，新近翻译的西学书近二十种。

在姚永概所读的前代著述中，韩愈文阅读次数最多，在三十一一年中有十年进行过阅读，而其他通过选本阅读韩文还有数次。光绪三十年日记中有“读韩公祭文，见其真厚之味，殆不可及”^③。韩文在所有桐城派文章选本中篇目皆十分突出，桐城派中人对韩文的诵读、笺注也皆用尽心力。姚永概对韩文的推崇，只是桐城文派系统延续的表征之一。韩文以外，姚永概还对《史记》（8）、苏轼诗（8）、《诗经》（6）、《庄子》（5）、《汉书》（5）、柳宗元文（5）、归有光文（5）、王安石文（4）、陆游诗（4）、《左传》（3）、《孟子》（3）、《荀子》（3）、李白诗（3）、韩愈诗（3），以及《战国策》、《法言》、《文选》、《管子》、《史通》、《通鉴》、《吕览》等书。姚永概在阅读这些桐城派共同推崇的经典或前辈著述时，也在参照摹拟撰写，日记中有数条记载：

大人命作《周烈妇传》，因取望溪文诵之。文成，乃自喜也。（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学柳文琢句，终未深雅，殊以自惭。（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初学骈文，寄与肯公（范当世）改之。（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八）

欲经营祭王闳孙师文，取《古文辞类纂》中哀祭诸作诵之，竟日未成一字。（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④

上引日记中，“学柳文”一条前有若干日读柳文的记录；“初学骈文”一条，在此前后皆有阅读《文选》的记录。摹仿以形神之似，为“喜”、“惭”之标尺，可知姚永概阅读沉潜之深。父兄师友亦持大家经典衡量、提示、督促：“吴先生阅余文毕，言近日文士气苦不盛，惟吾文气最好，眼中无与比，宜多读太史公、韩昌黎，异日必确有成就也。”（光绪十八年七月十七日）“早录昨文（《胡氏族谱序》）呈先生，甚蒙惊赏，以为归太仆集中最盛之作也。”（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七日）^⑤

姚永概所阅读的西书中，《天演论》自光绪二十五年之后，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九年又有阅读记录，其他如《泰西史揽要》、《群学肄言》亦受重视，桐城派自同治以后，在自我调整变化，以适应世变，这在曾国藩、吴汝纶、姚永概的日记中有较全面的反映。至于姚永概所阅读的本朝人著述中，桐城乡贤或桐城派的著述占绝大多数，与选择性阅读前代著述相比，更具流派意识。

二 桐城派文人圈与“批点本书籍交流网络”

桐城文人造就了桐城的人文传统和人文景观；同时桐城的历史和地域也塑造了桐城文人的“地方感”。以桐城派而言，它强化了身处桐城这一特定社会网络和山水之间文人的自信心与责任感。光绪十三年姚永概在日记中记录拟撰四种书，其中《桐城遗书志》、《桐城山水志》、《惜抱诗笺注》^⑥，于桐城人文，寓表彰阐扬之意。而姚永概见范当世弟范铠时，称其人“秀雅可喜”，读其文，“笔颇雄杰，

①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485页。

② 所谓“较为集中阅读”是笔者依据日记中所记录的阅读、抄录时间至少要有两三天之久。

③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933页。下文“()”中数字表示三十一一年中较为集中阅读的年份次数。

④ 分别见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406、486、503、555页。

⑤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509、552页。

⑥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325页。

议论篇幅不尽近桐城家法矣”^①，则略有桐城家法在兹的评判意味。《慎宜轩日记》中记载众多关于桐城前辈及桐城派诸家著述，书籍之数量和所用之尽力，皆可表明此举非同寻常。

为便于讨论，现将姚氏日记中记载过录批点、抄写书籍等事辑出，按年代排列，可得三十八条记录（见附录）。据此，可略作引申性论说：

其一，三十八个条目中，涉及诗选、诗注的有一半，如此则可在桐城文派之外，梳理桐城诗派的范围。若再拓展视野，还有“桐城《诗经》学”之名目^②。三学之间彼此关联影响，合并可称之为“桐城派”。

其二，桐城派选本、评注如此丰富，可见在诗文创作之外，在文学批评上也着意经营，并且天地开阔。若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统计，方苞五十一种著述中，编选、评注一类有十七种；刘大櫟三十一种中有二十五种，姚范十六种中有十三种，姚鼐四十五种中有二十九种，而晚期桐城派名家吴汝纶一百二十三种著述中有一百一十种编选、评注之作。如此丰富的文献，足以建构桐城派的文学批评之学。

其三，桐城派的诗文选本众多，但就具体文体、具体作家而言，不同的选本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篇目，如关于韩柳文、归文等在选目上不会有明显波动，亦即核心稳定，周边松动。所谓周边松动，或由选本的详略造成，如《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皆有简本；或由选家文学见解所致，但不导致较大的起落。

其四，就编选前代经典而言，当选本的文体类别、核心篇目基本确定后，选本进入稳定期，桐城派的选本大致有奠基性的“姚选时期”和调整扩充性的“曾选时期”，经此二时期几大家的挑选与建构，格局已定，难得有新气象的新选本出现。编选既然不能有所作为，桐城派文家遂转向经典篇章的注释、评说，推动桐城文章之学和桐城诗学向精微深细方向发展。

其五，上列三十八个条目中，有三十三条关于桐城先辈或时贤著述。这固然可说姚永概重视乡邦文献，但亦可说他具有强烈的派别意识，在三十八个条目之外关于诗文的编选、批圈，似乎难进入其视野。这类偏向性选择，在马其昶校注韩文时，亦清晰显现。马氏选择明清诸家注释共十八家，其中只有沈钦韩、何焯、恽敬、储欣、李光地五人不是桐城派统系中人（下文展开论述）。高步瀛在《唐宋文举要甲编》亦承此手法，其中注韩文，重要评注选择桐城派文家，其他清代注家，除选择何焯注较多外，钱大昕、段玉裁、俞樾、王念孙、王先谦之说，只是一二点缀而已。

姚永概抄写、过录诸书，绝大多数不是正常流通的刻本，可据日记记录追溯部分书籍来源：

“庸叔”：刘大櫟选五律、《历代诗选》；

“伦叔”：姚鼐圈点黄庭坚诗、方苞圈点韩文；

“子丰族叔”：《龙眠古文》；

姚永朴：姚范圈评韩文、《援鹑堂笔记》原刻本；

岳父徐宗亮：方世泽批本《汉书》、方苞自评点文集、姚鼐评《震川集》、《朱子全集》圈点本；

姊夫马其昶：曾选陆游诗、纪昀方世举评点苏诗、姚鼐评点《法言》、姚鼐评点《唐贤三昧集》；

姊夫范当世：吴汝纶过录本《史记》、范当世评点本欧阳修诗、范当世评点《古文辞类纂》；

吴汝纶：姚鼐圈点《文选》，姚鼐评点《诗经》，方苞姚鼐圈点《左传》，方苞注杜诗，吴汝纶过录本《史记》，吴汝纶评点本《论语》、《庄子》、《管子》、《五代史》、《吕览》、《书经》、《大戴礼》、《荀子》；

郑福照：批点本姚鼐诗。

在此之外，据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中的零星记载，还可辑出数种私家收藏的编选、批点之本：

马其昶：方苞评点柳文稿本、姚范评点《望溪文集》；

桐城倪士达：方苞《史记评点四家》原本；

①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358页。

② 此说见许结教授撰《徐璈〈诗经广诂〉考论》，未刊稿。

桐城程氏：刘大櫟评点《文选》；

桐城张氏：刘大櫟评点杜诗；

桐城吴棣村：刘大櫟评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①

姚永概所抄写、过录诸书，大致出自姚氏族、姻亲、同乡。以上所呈现，或许只是各家藏书的一小部分；桐城一县私家藏书，虽不如江浙两省中许多藏书之乡丰富，但如统合考察，桐城藏书，经明中叶以来数代积累，必有可观之处，这便是一种作为底蕴性质的地域文化资源。这一整体可观、然处于分散状态的藏书，如何能互通有无以尽其用？在传统社会，无疑需要亲戚、师友等私情才能开启私家藏书。桐城的社会关系十分独特，自明中叶以来，知名家族之间联姻的次数、密度、延续的时间，在其他地区难得一见^②，其中姚、方、张、马、刘等家族是这一繁密的姻亲网络中的关键家族。文学世家之间的联姻中有文化资源的流转，可促使家族性、地域性文化交流网络的形成。姚永概因为姻亲的关联，得以利用徐宗亮、马其昶藏书；甚至包括南通范氏之书，也进入这一私家藏书交流网络，而吴汝纶虽非桐城望族，但吴氏与桐城左氏、马氏联姻，吴汝纶孙女嫁姚永概弟姚永棠，故吴氏亦是桐城姻亲网络中的一个节点^③。作为乡贤前辈与老师，姚永概过录其评点诸书，也在情理之中。吴汝纶入曾国藩幕府八年，深得曾氏赏识，光绪六年补直隶冀州知州，光绪十五年主讲莲池书院。姚永概师从吴汝纶最久，过录吴代评注之本，多在冀州游幕期间。吴氏在直隶似颇留意搜集桐城派文献，如同治十三年五月，吴氏有日记：“张霭卿购得残本归文，内有望溪选读者，附记目录于此。”^④姚永概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三日日记：“过录杜诗评点，望溪手笔也，吴先生在京师以数金购得之，真奇缘矣。”^⑤姚永概可利用姻亲、师友、同乡等关系，拓宽所用图书资源的范围，并不局限于桐城一邑。

姚氏作为桐城诗书望族，书籍、字画有一定的积累。据姚永概光绪十六年日记，尝述及其家藏书在咸丰三年太平军攻打桐城时损毁惨重^⑥。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姚永概日记有“理先世手校书三篋”的记录，详列所存手校书目：

《四书》残本、《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残本、《南史》、高注《战国策》、《老子》、《关尹子》、郭注《庄子》、《庄子》、《荀子》、《楚词》、《吕氏春秋》、《韩非子》、《文心雕龙》、《通书》、《正蒙》、《韩昌黎集》、《杜工部集》、《韦苏州集》、《苏子美集》、《刘须溪记钞》、《五七言古诗钞》残本、《钞选宋元明人诗》、《淮南子》，以上姜坞公手阅本。杜注《左传》，抄本《古文》二、朱注《杜诗》，上三种亦姜坞公手阅，均有评点。

《五七言今体诗钞》原本、《抱朴子》，以上惜抱公手阅本。

《丙丁龟鉴》、《道德指归论》，以上幸斋公手阅本。

《古诗钞本》、《诗话偶录》、《庄子章义》抄本、方植之先生评点王选七言古诗抄本、《止隅录》，以上清寐轩手抄本。《四书或问》、《七言古诗选》、桐城先辈遗文抄本、《古文辞类纂》吴本录方、刘、姚三先生评点，以上清寐轩手阅本。……

植之先生诗文抄稿、《大意尊闻》、姚伯山先生遗稿、郑容甫先生杂稿、光栗园先生遗稿、《栗园行略》、《昭昧詹言》、《岭云轩琐记》原稿、俞陶泉《盐归场灶议》，以上先世来往友朋所托书。

① 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396、407、408页。刘大櫟“评点杜诗”条后有刘声木注：“极为精细，五言长律转折、段落、筋脉，一一分明。”（第408页）

② 桐城文学世家联姻情况，可参拙著《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204页。

③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667页。此条材料，笔者编撰《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时漏检，特此说明。

④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第825页。

⑤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551页。

⑥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443页。太平军与清军在桐城拉锯战达九年之久，桐城文化所受之毁伤，似可推想。

《金刚经》一本、《大学说》，以上植之先生手批。

《南山日记》，此系南山先生亲笔。

刘海峰文一本，姜坞公手阅者。^①

姚永概可借阅他家藏书；互通有无，自家藏书也可被姻亲、师友、同乡借阅。在《慎宜轩日记》中，有数条自家批点本被过录的记载，如：光绪八年，二姊姚倚云（适范当世）以《五七言今体诗钞》，命为录姚鼐圈点；光绪十年，萧穆寄《汉书》托录姚范圈点；光绪十一年，马其昶托过录望溪自评点文一卷；光绪十三年，陶心翁托录姚鼐《渔洋精华录》评点。又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出家所藏手卷，字画示通伯。”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二日：“仲勉来，与强丈索予家字画手卷观之，谈笑竟日，古欢盎然，致足乐也。手卷计十七轴。”次日：“仲勉、通伯又来，偕强丈索予家所藏册页观之。”^②从常理以及姚永概行文语气看，留有先人手迹的书籍及手卷、字画，及家中珍藏，似不轻易示人。此处暂以姚永概为中心，被借阅的藏家，还有托其过录自家藏书诸人，以及观其家珍藏诸人，是同族或关系十分亲密之人，其中存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人圈，在此圈内，书籍流通较为公开顺畅；外人似乎不易进入这一书籍交流网络。姚永概选择性地读书，选择性地过录批点，也显示桐城诸大家族家学的封闭性特征，以家学为基础的桐城文学、诗学、经学，或多或少亦有此特征。

更为重要的是，在姚永概书籍交流网络中存在或流通的书籍特征。书稿经编辑刊刻，进入市场，便成为批量的公共出版物，其中每一部呈现在所有阅读者目前的信息量是相等的。但上文所列的众多书籍，与公开流通的书籍不同，其中有未刊的稿本，有圈点本，有批注本，姚永概看到的《史记》、韩文、震川文之类，与通行本大不一样，其中负载大量“附加信息”，出自诸多前辈的朱笔、墨笔、黄笔、紫笔、蓝笔批点，将不同时空中的声音凝聚在眼前的文本之上，批点中所包涵的认同、引申、疑问，构成关于所批点文本的多重对话。

对话的形成，有赖于类似姚永概所持续进行的抄写、过录工作，如上文所言，汇集性的抄写、过录只能在此特定的书籍交流网络中展开。这一交流网络传播的主要是未完全公开的“附加信息”，有一定程度的私密性，据此似可暂名此网络为“批点本书籍交流网络”，交流的目的，在于以详此略彼的手法汇合桐城派诸家关于古文与诗的“众声”，强化“天下文章出于桐城”的观念。“批点本书籍交流网络”在桐城文士及其姻亲中表现最为明显，而在此之外的其他桐城文家之中，则因文献不足，相关交流则相对稀淡。

学校中的传道受业，为公开性质；家学传承，或多或少具有独得之秘不传外人的倾向；包括姚永概在内的桐城诸人，总会承继一些作为文化资本性质的“先世手校书”，这类珍藏作为他们在文坛、诗坛或举业中角逐提供有力支撑。桐城世家的内向性联姻^③，有意无意推动“批点本书籍交流网络”的构成，并进一步强化交流的“私密性”与“地域性”。家学的特色，与文化资源、治学方法的“私密”有关联；而以家学为基础形成的地域性文学、学术流派，其与众不同的“地域性”，或许也当在家学“私密”特征中寻找基因。

①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346页。引文中“姜坞公”，乃姚范；“幸斋公”，乃姚莹；“清寐轩”，乃姚潜昌；“植之先生”，乃方东树；“姚伯山先生”，乃姚鼐；“郑容甫先生”，乃郑福照；“光栗园先生”，乃光聪谐，姚永概外祖父；“南山先生”，似指戴名世。以姚永概光绪十六年日记所记中复堂所存书目，对照姜坞公姚范手阅之书，尚有《文选》、《古今通韵》、《道德指归论》、自抄古诗文七册可以补充。此外圈点《通鉴》已失，点阅《十三经注疏》不明存佚。

②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245页。家藏字画手卷十七轴，其中有“惜抱轩临王大令帖，惜抱轩家书，惜抱轩尺牍，惜抱轩与先通议公（姚莹）手札；先通议《谈艺图》，陶文毅题；先通议公《龙眠丙舍图》，陶文毅题；……赵文恪与先通议手札；大人师友手札二通”。

③ 举笔者编撰《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中所录桐城方、姚、张三家族为例，方氏联姻共一百二十五次，省内联姻八十四，其中桐城七十八次；姚氏联姻一百六十四次，省内联姻一百四十四次，其中桐城一百二十六次；张氏联姻一百九十八次，省内联姻一百七十六次，其中桐城一百七十一。这些家族的联姻对象绝大多数在桐城本县（见该书第12页）。

三 桐城之学的累积、融汇与整合

桐城派的批点之风，似肇始于对归有光圈点《史记》本的过录、熟读，其后渐及其他经典，以至对望溪文、惜抱轩诗的笺注。唐文治云：“圈点之学，始于谢叠山，盛于归震川、钟伯敬，而大昌于方望溪、曾文正。”^①此语有一家之言的偏重，但从上文所述，以及方苞、刘大櫟、姚范、姚鼐以至吴汝纶著述的著作构成比例来看，也道出桐城派为学的一种特色。

姚鼐重圈点之学，所编《古文辞类纂》最初刊印就有一种圈点本；在与友人书札中，指出：“震川阅本《史记》，于学文者最为有益。圈点启发人意，有愈于解说者矣。”^②桐城派过录批点之风气，大约在嘉道之际就已盛行。“岭西五家”之一的王拯是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在《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序》中描绘在京城所见过录方苞评点《史记》的情形：

余始通籍，官京师……与仁和邵位西舍人从上元梅先生游。……日与位西游厂肆，见《史记》评点本，朱绿烂然，以告先生，曰：此望溪笔也，不知何人所录。……展转于吾友唐子实而归余，位西喜，假录焉。余又从梅先生乞过震川评点于上。盖归氏学尤深《史记》，其评点世多有，独梅先生尤精，方氏讲于为文义法，而所评点则罕流播，故自余得此传本后，同游奔走相告，从假录者几无虚日。^③

至光绪年间，张裕钊对桐城派前辈王拯所刊《归方评点史记合笔》有不满之意，称“（王氏）自以为得其真，以余观之，亦尚多可疑者”^④，遂有《王世贞归震川方望溪吴挚甫评点本史记》刊刻。就《史记》批点而言，从方苞、梅曾亮、王拯到张裕钊，其中有传承、累积，亦似有选择、质疑。批点、过录之盛行，表明桐城派的文章之学（或许还有诗学）进入融汇整合的时期。查刘声木《桐城文学撰述考》，关于《史记》的批点注释之书有十九种，《左传》有二十三种，唐宋八大家（含单行专家本）有十一种。诸如此类，编选、批点之本的纷繁，也是融汇整合的必要文献准备。学问的融汇与整合，建立在累积基础之上。上文所引光绪十四年《慎宜轩日记》“理先世手校书三篋”，所列姚范、姚鼐、姚莹、姚濬昌手校之书，对照姚永概日记，“先世手校书”基本在其所记阅读诸书范围之内，先辈在书籍上留下的“附加信息”，经姚永概的过录、阅读而累积。从书目中可见《古文辞类纂》至姚濬昌已过录方、刘、姚三先生评点^⑤，《五七言今体诗钞》、《五七言古诗钞》姚氏数代人都留意编选注释，据最近学者的研究，可见其中累积的过程：

世传姚鼐《今体诗钞》刊本中并没有姚鼐的圈点，民国贺培新所藏《七言今体诗钞》中过录有姚鼐圈点。贺氏于此集卷首扉页书云：“戊寅十月，于姚慕庭（姚濬昌）所得定本《七言钞》，圈点间有异同。其题上均有圈识，有朱笔临之。绿笔，刘海峰本。”^⑥

据此可知《今体诗钞》有通行刊本与圈点本之别，圈点本至少有姚鼐、刘大櫟手迹，经姚濬昌过录，内传至姚永概，外传至桐城派在直隶的一支^⑦。前引王拯序文中已见道光年间桐城派诸家过录《史记》

① 唐文治《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序》，《国文经纬贯通大义》卷首，1925年印本。

② 姚鼐《答徐季雅》，《惜抱轩尺牍》，同治五年刻本。

③ 王拯《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卷首，光绪元年锦城节署刊本。

④ 张裕钊跋，《王世贞归震川方望溪吴挚甫评点本史记》卷末，光绪四年武昌张氏刊本。

⑤ 姚鼐《古文辞类纂》乾隆四十四年（1779）编成，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刻，据方苞（1668—1749）、刘大櫟（1698—1779）的卒年，二人不可能评点《古文辞类纂》，姚濬昌所录，当是方、刘有评点诸如韩文、柳文之作，姚氏将相关批点过录汇集于《古文辞类纂》之上。

⑥ 韩胜《从〈今体诗钞〉看姚鼐的诗歌批评》，《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86页。

⑦ 贺培新为贺涛之孙，师事吴闿生，生于1903年，卒于1952年，不能直接从姚濬昌（1833—1900）处借得《七言今体诗钞》。戊寅年，就贺培新而言，当指1938年。此时姚永概已辞世十余年，姚永朴避地宿松。故贺培新藏本当是家传之物，再细绎扉页题识语气，题识似是贺涛手笔。

之事,此风在晚期桐城派文家中依然不减。贺涛师从张裕钊、吴汝纶,受古语法,据其子贺葆真日记所载,光绪十六年贺涛过录刘大櫟、姚鼐《左传》评点,过录姚鼐、吴汝纶评点《诗经》,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记其父亲手过录书如《史记》、《古文辞类纂》共十种,所过录评点,绝大多数出自前辈桐城文家之手^①。贺涛所过录的数种书籍,多有吴汝纶评点,结合其从吴汝纶问学时间,这些书籍应是吴汝纶的收藏。

圈点或过录圈点,几乎是桐城派文家共同认可的学习方法,在面对共同推崇的经典,如《史记》、唐宋八大家、震川文时,他们依循评点,分析文章的脉络、提顿和关锁,体味文章的精彩华妙,“评点虽专主于文章义法,而亦有涉议论考据,盖二者与文章义法原一贯,且有必相引发之处”^②。过录诸家批点,其中必有思量、比照、贯通。姚永概光绪十六年日记:“肯堂有评点《古文辞类纂》,予取录一通,以为用功之助,其中颇有与惜抱公异者,亦可参较得失也。”^③光绪二十六年日记:“录梅伯言惜抱文圈点,似不及吴(汝纶)精当。”^④在此过程中,时有深入的思考。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姚永概过录从“伦叔”处借来的方苞评点韩文,二十一日日记中有与马其昶讨论方苞评语的文字:

与通伯谈望溪深非韩公《潮州刺史谢上表》、柳公谪时与诸故人书,皆嫌其气不能振。通伯言柳公之文实佳,而气则实卑,但语语是悔过,并不自文,是他好处。予谓有《洸吏》一诗,而《谢上表》则出于恋阙之诚可知也。有《与孟尚书书》,则与大颠往还,不为其所惑可知也。要之,望溪之论人不可不知,而二公之长亦不可不知。^⑤

方苞的评语是:“退之之气不能不挫于岭表,而东汉一曲之士皆能视死如归,可觐二代风教所积之异。”^⑥姚永概与马其昶的讨论,由方苞评点韩文引起,涉及韩柳文的比较,又引诗参证,探求心志与文气之间的关系,牵涉到桐城文论中的核心概念“气”^⑦。二人的讨论,很可能影响到马其昶补注《韩昌黎文集》。马其昶于《谢上表》一篇,选何焯、储欣、刘大櫟、曾国藩、张裕钊诸家之语,未录方苞之语,赞同韩文“无乞怜,只自伤”之意,亦认可“恋阙之诚”。

过录批点,能在比较中凸显桐城文派中一些未曾受到研究者注意的问题,此即方(或姚)修改归文之事。姚永概日记中两次提及此事,其一在光绪十年闰五月,“抄惜抱先生改本《遂初堂记》。读震川古文”^⑧。检《震川文集》与《古文辞类纂》所收《遂初堂记》,文字完全相同。可见姚鼐是另一文本中改动这一归文名篇。其二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姚永概因从岳父徐宗亮借到姚鼐圈评《震川集》,重提此问题:

借外舅所录惜抱圈评《震川集》来过录之。此本张筱传方伯得之京师,以赠其族兄小愚大令,通伯得而传录焉。其中窜易原文至多,而《项脊轩》《遂初堂》二记、《亡儿鬻孙圻志》尤甚。吴至丈及外舅皆以惜翁未肯轻改古人,不蹈方、刘结习为疑。余谓惜抱于渔洋《故明景帝陵怀古》亦尝钩乙,或以其时代较近,不似八家以前过事矜慎,亦未可知。但其圈评全主义法,又连点之

① 据贺葆真记,十种书中九种书是《史记》过录归有光、方苞、张裕钊评点(与贺沅合作);《古文辞类纂》过录姚鼐、方苞、刘大櫟、张惠言、张裕钊、吴汝纶评点;陶集过录刘才甫、姚鼐、方东树、吴汝纶评点;《荀子》过录姚氏评点;杜诗过录张裕钊评点,《汉书》过录姚鼐、吴汝纶评点;《淮南子》过录吴汝纶评点;韩集过录吴汝纶、张裕钊评点;柳集过录方苞、吴汝纶评点。《贺葆真日记》,《历代日记丛钞》第131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页。

② 王拯《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凡例》,《归方评点史记合笔》卷首。

③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446页。

④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782页。

⑤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240页。

⑥ 吴孟复、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页。

⑦ 桐城派文家关于“气”的论说,可参姚永朴《文学研究法》,《姚永朴文史讲义》,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⑧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176页。

中杂以坐圈，皆极似望溪手笔，不与惜抱阅他书相类。闻张濂翁亦持此说。通伯坚执原本亲见，确系惜抱亲笔，且首册载年号、图章，不信传录望溪，其为惜抱无疑。然余谓此与今古文《尚书》正同，不必别俟考证，其词气较然分别也。要之，先辈所阅之书，无论方、姚，均足启发后进，洵可宝耳。^①

上引文字中，有几点内容似值得留意：其一，圈点本仍在桐城或桐城派诸家中流通，其中“张筱传”即同治十三年进士桐城张英六世孙张绍华；其二，圈评改易出自何人之手，有两派观点，吴汝纶、徐宗亮以为出自方苞之手，而张裕钊、马其昶、姚永概以为是姚鼐批点；其三，甯易归文外，又钩乙渔洋诗作。

如何改动，对于姚永概而言，在过录时对照文本，即可从差异中领会其用心所在。今圈评本《震川集》未见。此前，同治十三年五月，吴汝纶过录合肥张华奎所购归文残本一册。吴氏定为方苞选读共三十三篇，其中四篇有方苞评语或吴氏按语：

《李廉甫行状》，方评：所谓叙事繁重而气能包举，亦集中杰构，但首尾琐细语尚宜剪裁。

《曹节妇碑阴》，结处方节去“五十年”十一字，谓为俗句。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志》，文中有“予家人皆得挹其慈范”句，方云俚语，不宜入古文。

《先妣事略》，方云：此等文便直接韩、欧，形貌不似而相同在骨法也。^②

联系上文姚永概日记所述圈评《震川集》中的两派观点，吴汝纶所录当是圈评本中的一小部分。正如姚永概所言，这种圈评之书，“无论方、姚，均足启发后进”。所谓“启发”，当在观看如何批点改易处体会。上列四条引文，前三条分别是指行文中的繁重琐细、俗句、俚语之病，笔锋所指，当然是桐城文家关于古文的“清规戒律”中内容^③，目的是追求文章的醇雅简洁。然此举实有不同寻常之处，为捍卫纯正古文的理想，方氏或姚氏可以动手改易自己推崇的大家之作。此举或许可以称之为文学史上的“修正润饰经典”或“重塑经典”。诗作（如唐诗）在流传中此种修饰、重塑现象也有不少，然似皆不及方或姚意图如此明确、思虑如此周备。

过录诸家批点，最后形成一家之言。虽说是“一家之言”，但实际上是一种汇集、疏通性的著述。姚永概在正志中学任教时，编有《孟子讲义》十四卷，此书以阐述义理、讲解文法见长。然就关于《孟子》的浩繁著述体系而言，讲文法才是《孟子讲义》最有特色的部分。该讲义引述清人及近人著述时，大多在桐城派范围之内，统计所得引述次数：刘大櫟二十六次，方宗诚二十次，“方氏”十三次，吴闿生九次，徐树铮五次，范当世三次，高步瀛一次。如讲《离娄上》“天下大悦而将归己”一节，先引刘大櫟“起处全用逆笔，最奇”之说，接续的是姚永概的解说，从第一句凭空突兀说起，以至“不顺乎亲”，解释何谓“全用逆笔”^④。又讲《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一节，引方氏语：“此传记体也。本为

① 姚永概《慎宜轩日记》，第781页。

② 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第824—825页。《李廉甫行状》，在《震川先生集》中未见，结合方氏评语，或是指《震川先生集》卷二五中《李南楼行状》。《曹节妇碑阴》节去十一字指“五十年高风劲节，可以想见”（见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573页）。《先妣事略》评语，吴孟蒋立甫主编《古文辞类纂评注》，标为姚范评语（见该书第1262页）。如此，则圈评《震川集》仍有疑点。关于《震川集》的评点本，杨峰指出清初至民国初，“除黄宗羲、陈维崧、崔征麟、曾国藩、林纾、徐世昌等人的选评本在当时已刊行外，尚有董说、鲍倚云、张士元、王元启、庄述祖等十数家的评点资料并未刊行”（见《〈震川集〉的清代未刊评点五种》，《文献》2011年第2期，第74页）。不知方或姚的圈评本是否在“十数家”之列。天津图书馆藏康熙刻本《震川先生集》有李国松过录姚鼐评点及诸名家评语（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22页）。

③ 关于桐城文家自方苞以至林纾的古文“戒律”，可见钱锺书《林纾的翻译》（见《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5、112页）。

④ 姚永概《孟子讲义》，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31页。

人之求富贵利达者而发，然正说则无含蓄，故就齐人描写如生，而正位只淡淡一点，无限烟波。”^①后引徐树铮语及自己案语，皆发挥方氏语，但姚氏又点出韩愈《圜者王承福传》、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得此节叙事法则，以见文章源流。而刘大櫟“烟波”一词及分析方法，姚永概在《万章》讲义中再引述一次，并在《尽心上》讲义中有所运用。

积累前辈桐城派文家的注解而成一种著述者，典型有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高步瀛的《唐宋文举要甲编》^②。此处以与姚永概交往十分密切的马其昶著作为例，作为桐城派形成衍变考察的个案。《韩昌黎文集校注》的作者本人在此处似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著作的类型和内容。今通行本《韩昌黎文集校注》卷首有马茂元撰“叙例”，指出该书成书大致经过：

书（东雅堂本韩集）前有题记二，一为光绪二十年冬十二月，记云：“点读一过，并录先师张廉卿先生及吴至甫师平语，凡九日毕。其文中圈点，以私意衷取二家，不尽依原本。”其一则记于光绪三十三年。时公馆合肥李氏。李氏富藏书，公复博采诸家之说，补苴旧注，增益十倍于前。^③

上文中可见马其昶过录批点的简况，而“以私意衷取，不尽依原本”，正是桐城之学积累融汇的表征之一。经统计，《韩昌黎文集》八卷（不含“外集”、“遗文”）共采用唐顺之、茅坤、归有光及清人注释一千一百三十九条，其中曾国藩三百二十六条、沈钦韩二百六十九条、方苞一百二十一条、张裕钊一百一十八条、何焯七十九条、姚范五十七条、刘大櫟四十一条、吴汝纶三十九条、姚鼐二十五条、茅坤十五条、李光地十二条、归有光十一条，其他如唐顺之、孙葆田、梅曾亮、储欣、方东树、王元启、刘熙载、王鸣盛、包世臣皆不足十条。一千一百三十九条中，桐城派文家（明代茅、唐、归未列入）注释有七百五十八条，其中关于文章之学的有四百四十一条。引沈钦韩注二百六十九条中仅有九条是文章之学，何焯注七十九条中有四十五条是文章之学，姚范注五十七条中有十八条是文章之学。

马其昶“融会群言，自具炉冶，凡所甄录，并刊落浮词，存其粹语，盖非独于沈氏（钦韩）书为然也”^④。在融会群言中，桐城派谱系中人物及被选用注释数目，皆有明显优势，注释的选用，也多从文章之学入手；这与选择沈钦韩注重考据不同。在韩文校注中，马其昶汇合了桐城文家之力，完成对韩文的阐释体系的建构。

马氏在校注韩文时，基本上是运用前人注释表述自己的见解，其策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利用“众声”，表达文章的多重特色。

（《新修滕王阁记》）方苞曰：回环作态，欧公记所本。……姚范曰：风格峻朗，公之义老境如此。曾国藩曰：反复以不得至彼为恨，此等蹊径自公辟之，亦无害；后人踵之以千万，乃遂可厌。^⑤

（《送郑尚书序》）方苞曰：字句皆学《仪礼》。刘大櫟曰：措语形容，一一奇崛，乃韩公本色。曾国藩曰：气体似《汉书·匈奴传》。张裕钊曰：从《史记》匈奴传外夷诸传出，简古奥峭，却有余意。^⑥

其二，在表达共识时，暗涵批点诸家体味之细微差别。

（《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茅坤曰：风雅。刘大櫟曰：……此篇运辞典雅雍容，而雄直之气自在，足征才力之大。……曾国藩曰：和雅渊懿，东京遗调。^⑦

① 姚永概《孟子讲义》，第154页。

② 高步瀛在《唐宋文举要甲编》中选用吴闳生注一百四十九条，茅坤注一百三十八条，李刚已注一百二十七条，吴汝纶注七十条，张裕钊注四十九条，方苞注四十八条，刘大櫟注四十三条，姚鼐注三十九条，唐顺之注二十六条，姚范注十九条，其他如徐树铮、姚永朴、姚永概注各数条（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④ 马茂元《韩昌黎文集校注叙例》，《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页。

⑤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91页。

⑥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83页。

⑦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39页。

《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曰：公之奇崛战斗鬼神处，令人神眩。姚范曰：凄丽处独以健倔出之。……刘大槐曰：昌黎善为奇险光怪之语以惊人……其所经山川险阻患难，适足供其役遣，故能雄肆如此。^①

其三，注释之间互释，或彼此引申发挥。

《《守戒》》方苞曰：此篇为老泉之文格所自出。张裕钊曰：老泉学之，更加纵横；而高古简峻，终逊退之。^②

《《祭郴州李使君文》》方苞曰：此赋体也，其源出于陆机《吊魏武帝文》。曾国藩曰：亦不出六朝轨范，不使一秣丽字，不着一闲冗句，遂尔风骨道上。^③

其四，运用注释梳理、构建文章演变源流谱系。

《《原毁》》方苞曰：管、荀、韩非之文，排比而益古，惟退之能与抗行。自宋以后，有对语则酷似时文，以所师法至唐人之文而止也。张裕钊曰：通篇排比，下开明允，而其源出荀、韩。^④

《《唐故朝散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归有光曰：欧、王多有此格。刘大槐曰：韩公文法劲挺独造，独此篇叙次遒逸，风神略近太史公。^⑤

其五，利用注释批评质疑，确立一种更为可靠的解释。

《《张中丞传后叙》》方苞曰：退之序事文不学《史记》，而生气奋动处，不觉与之相近。刘大槐曰：通篇议论，盘屈排奭，锋铓透露，皆韩公本色。鹿门以为太史公，误矣！^⑥

《《黄陵庙碑》》方苞曰：体近训诂，而不类汉唐人之滞晦，宋以后之冗弱。曾国藩曰：此等题以高简为要，百数十言足矣。^⑦

注释、评注及其选择、汇集，最终目的是使相关文章意义及其文学特征清晰呈现。姚永概以及马其昶的过录，充分利用桐城派文家积累的心得，以自己的识力与体味，对前辈或时贤的成果进行组合，在众声喧哗中归整出一种解释，其目的在于弥合裂缝，强化共识。选择性汇集，也使得此前分散的注释之间形成比较、对照，形成一种较为稳妥、周全、细密的注释系统。

结 论

《慎宜轩日记》虽是较为晚近的文献，其中清代时段的日记详尽地反映了传统社会诗书世家子弟的人生经历，虽为个案，但在明清社会应具有一定“类”的代表性。以姚永概日记中的读书内容所作的考察，也可引发对一些文化史、文学史问题的思考。总结全文，可得以下引申性结论：

其一，姚永概的读书范围，读书兴趣受其家学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可视为“内在的规定”。接受此指向性规定，包括藏书、父兄等的指点一类家族文化资本可被有效承继并加以转化，而家学亦能由承继者弘扬。

其二，姚永概读书对桐城乡贤、桐城派著述的偏重，是其家学意识和流派意识的显露。而其所读之书牵涉一个以血缘、姻亲、师友等关系形成的桐城派文人圈，在此网络中，图书资源可以较为公开地流通。

①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312页。

②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51页。

③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308页。

④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23页。

⑤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517页。

⑥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73页。

⑦ 《韩昌黎文集校注》，第495页。

其三，桐城派的著述中编选、批点著述十分丰富，其中蕴涵桐城文章之学、桐城诗学的重要内容。以姚永概等桐城文家来考察，围绕批点本存在“批点本书籍交流网络”，这一网络的私密性质是家学传承私密性的一种表现，它也影响到以家学为基础的地域性文学、学术流派的性质。

其四，桐城派中后期过录批点风气的形成，意味着桐城文章之学、桐城诗学开始进入累积、融会与整合时期。过录中既有家学的累积，也有一流派之学的汇合，最后形成对共同认可的经典文本较为稳妥、周全、细密的解读。对于一文学流派而言，这是框架建立后的丰实充盈。

其五，过录批点有明显的流派性偏向选择，过录是弥合论说体系中的裂缝，强调共识的过程。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是桐城派文家过录批点风气中有普遍意义的个案。过录中有批点的比较、对照，其中隐含诸多问题，而吴汝纶、姚永概等关注的方苞（或姚鼐）改易润饰作为经典文本的《震川集》，具有较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附录：《慎宜轩日记》所记姚永概过录批点、抄写书籍等事辑录

（一）光绪七年

1. 过录姚鼐评点《渔洋精华录》（亦见光绪八年）；
2. 过录姚鼐《五七言今体诗钞》（亦见光绪八年、九年）；
3. 抄姚潜昌选五七绝；
4. 抄方东树选评曾巩诗；
5. 抄刘大櫟选五律（亦见光绪八年）；

（二）光绪九年

6. 过录姚鼐诗批点；
7. 过录方苞《古文约选》批点（包括两汉文、韩文、柳文、欧文、王文）（亦见光绪十一年）；

（三）光绪十年

8. 过录方世举批本《汉书》；
9. 过录姚鼐圈点黄庭坚诗（亦见光绪十一年）；
10. 过录姚范《史记》圈点；

（四）光绪十一年

11. 过录方苞自我评点文集；
12. 过录纪昀、方世举评点苏诗；

（五）光绪十三年

13. 过录姚范诗圈点；
14. 看刘大櫟选明人七古；

（六）光绪十四年

15. 过录姚范《南史》记语（亦见光绪十五年）、《望溪集》记语；

（七）光绪十五年

16. 过录范当世《十八家诗钞》中李白诗圈点；

（八）光绪十六年

17. 过录范当世评点《古文辞类纂》；

（九）光绪十八年

18. 过录姚鼐圈点《文选》；
19. 过录张裕钊评点杜诗；
20. 抄录姚鼐选绝句目；

21. 过录姚鼐圈评韩文；
(十) 光绪十九年
22. 过录刘大櫟评点《孟子》；
23. 过录吴汝纶手抄《论语》、《大学》、《中庸》；
24. 过录姚鼐评点《礼记》、《诗经》、《逸周书》；
25. 过录吴汝纶评点《庄子》、《管子》、《吕览》、《书经》、《大戴礼》、《荀子》；
26. 过录方苞评点杜诗；
(十一) 光绪二十一年
27. 过录姚鼐评点《法言》、《唐贤三昧集》；
28. 过录吴汝纶评注《墨子》；
29. 过录吴汝纶、范当世过录《史记》诸家评语；
(十二) 光绪二十六年
30. 过录姚鼐评点《震川集》；
31. 过录梅曾亮评点惜抱轩文；
(十三) 光绪三十年
32. 过录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
(十四) 光绪三十二年
33. 过录吴汝纶评点《十八家诗钞》；
34. 购得姚范批《曝书亭诗》、刘大櫟诗；
(十五) 光绪三十四年
35. 过录姚鼐圈点刘大櫟《历代诗选》；
36. 过录姚范批茅选八家文集中欧、曾、王三本；
(十六) 宣统三年
37. 过录吴汝纶评点柳文；
(十七) 宣统三年
38. 过录姚范批校王安石诗。

[作者简介] 徐雁平，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专著《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等。